

扑灭了二次革命，袁世凯不但专制独裁，还想复辟帝制，为此，他采取多种手段加强了对社会舆论和新闻界的控制：

（一）创办御用报纸和收买报纸报人。自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立即着手创办和收买报纸：在北京，创办了《国权报》。《金刚报》和《亚细亚日报》；在上海，接办了《神州日报》；在广州，接办了《时敏报》；在长沙，创办了《国民新报》（后改名《大中报》）。在这些报纸中，较有影响的是《亚细亚日报》和《神州日报》。《亚细亚日报》由帝制分子薛大可主编，了佛言、樊增祥、易实甫等任撰述，日出三大张，是御用报纸中影响最大的一家。二次革命期间，该报领衔发表所谓的《讨贼露布》，以后又连续刊登帝制分子劳乃宣和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古德诺鼓吹复辟帝制的文章，报道筹安会的劝进活动。袁世凯称帝期间，该报带头改用“洪宪”年号，称袁世凯为“今上”，记者署名“臣记者”。1915年9月，《亚细亚日报》增出上海版，遭到革命党人和爱国人民的强烈抵制，报馆两次被炸，勉强拖到1916年停刊。《神州日报》于1915年被袁强行接办，袁利用它原来在读者中的声誉作为帝制自为张目，一时起到过蒙骗作用。袁党控制和收买的报纸不少。御用党公民党也在各地办了一些报纸。共和党一进步党系统的报纸在复辟帝制的阴谋暴露之前也基本上是亲袁的。此外，像北京的《国华报》、《黄钟日报》、《大自由报》和《新社会日报》，上海的《大共和日报》和《时事新报》，长沙的《大公报》，广州的《华国报》等，也都被袁世凯收买。据不完全统计，袁世凯执政期间直接或间接收买的报纸在125家以上。他收买报纸和报人的手段很多，有的是一次付以重金，有的是长期发放津贴，有的则是零星施舍。

（二）制定法律、条例来限制言论出版自由。为了使摧残舆论的暴行合法化，袁世凯在执政期间先后颁布了《戒严法》、《治安警察法》、《报纸条例》和《出版法》，对报刊的登记、出版、发行、言论、采访、编辑等活动横加干涉。《戒严法》和《治安警察法》都赋予警察机关以随时禁止报纸出版的权力。1914年4月颁布的《报纸条例》共35条，其中规定：禁止军人、官吏、学生和25岁以下者办报；报纸出版须到警察机关登记并交纳保证金；禁止报纸刊登“淆乱政体”、“妨害治安”和各级官署禁止刊载的一切文字；每天的报纸在发行前须呈送报样给警察机关备案。同年12月袁政府颁布《出版法》，对包括报纸在内的一切文字、图画印刷物都作了类似的规定。尽管法律已经十分苛细，而各地官府在执行的过程中，又层层加码。如法律规定报纸在发行前须送警方备案，有的地方在执行中发展成了发行前的预审制度；法律规定交纳保证金是100~350元，一些地方提高到700元，无力交纳者即勒令停刊；法律规定25岁以上的人才能办报，有的地方则改为35岁以上等等。

（三）用暴力手段任意摧残报业、迫害报人。报刊。报人动辄得咎，即使噤若寒蝉，也会祸从天降。天津的《公民日报》、《赤县新闻》和《新天津报》，上海的《民国日报》、《民信日报》。《中华新报》和《共和新报》，长沙的《湖南通俗教育报》等一批新出版的反袁报纸，都被扣以“逆报”的帽子查封或禁销。即使是原来拥袁的报纸，只要对复辟帝制发表了不同意见，也难逃劫难。像北京的《新社会日报》、上海的《时事新报》等，都被扣以“妨害治安”等罪名查封或禁邮。迫害报人的事件层出不穷，如北京《民主报》主笔仇亮、原《国风日报》主笔吴鼐、汉口《大公报》编辑余慈舫等，都是被冠以“暗助党人”、“煽惑军心”等罪名杀害的。报人因言获罪而系狱的事，更是司空见惯。《大汉报》的胡石庵、《民立报》的张季鸾、《湖南通俗教育报》的何雨农、《四川新闻》的魏绰云、《警华报》的辛丹书等，都因触犯禁令而坐牢。至于受到传讯、申斥和各种处罚的人，那就更多了。

据统计，在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袁世凯统治时期内，全国报纸至少有71家被封，49家受到传讯，9家被反动军警捣毁。全国报纸总数始终维持在130~150家上下，形成了持续四年的新闻事业的低潮。新闻记者中至少24人被杀，60人被捕入狱。袁世凯给我国新闻事业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黄远生在《忏悔录》一文中曾痛心地说：“余于前清时为新闻记者，指斥乘舆，指斥权贵，肆其不法律之自由，而乃无害。及于民国，极思尊重法律上之自由矣，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岂中国固只容无法律之自由，不容有法律之自由乎？”^①

然而，复辟帝制不得人心，大多数报刊都站到了袁世凯的对立面。最先起来反袁的是孙中山重组的中华革命党、老同盟会员和一些民主主义者所办的报刊。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在日本东京创办《民国》杂志和《甲寅》杂志，分别由胡汉民和章士钊主持笔政，进行反袁宣传。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主要言论机关是1916年1月22日创刊于上海的《民国日报》，其次还有《中华新报》、《共和新报》、《长沙日报》等。它们都受到过袁政府的迫害，但反袁立场更加坚定。在袁世凯帝制自为期间，它们拒用“洪宪”年号，明确表态支持护国军的武装斗争。就连原先拥袁、亲袁的一些报纸和报人，在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帝制的震撼下，也转而加入了反袁的行列。梁启超写了一篇反对复辟帝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派人送去20万元请他不要发表，被梁启超拒绝。这篇文章在《大中华》杂志发表后，各报争相转载，影响很大。一些历来比较保守的报纸，如上海《申报》、香港《华字日报》等，也改变态度支持反袁。《申报》曾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袁世凯的贿赂，指责帝制活动是“无端自扰”，“实难赞同”。真正死心塌地为袁世凯称帝作鼓吹的，最后只剩下《亚细亚日报》等几家御用报纸。

1916年3月，袁世凯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迫取消帝制，接着于6月去世。反袁斗争取得了胜利，新闻界也得到短暂的复苏。

- 1 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
- 2 民国临时政府的新闻事业的繁荣与政权的峰起
- 3 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新闻事业的反袁宣传
- 4 袁世凯对新闻事业的加
- 5 军阀专制统治下的新闻事业的著名记者和报刊业务
- 6 黄远生
- 7 邵飘萍
- 8 其他著名记者
- 9 新闻业务的转变
- 10 学习思考题

① 《远生遗著》卷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2页。

[在线查询](#) | [在线讨论](#) | [帮助说明](#) | [版权信息](#) | [联系我们](#)